

GUODIAN JINGJIXUE

古典经济学

晏智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071683

古典经济学

晏智杰 著

F717

人行研究生部藏书
分类号 F091.33/3
总号 071683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经济学/晏智杰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4

ISBN 7-301-03689-2

I. 古… II. 晏… III. 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IV. F091.

33

书 名: 古典经济学

著作责任者: 晏智杰 著

责任编辑: 符 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689-2/F·267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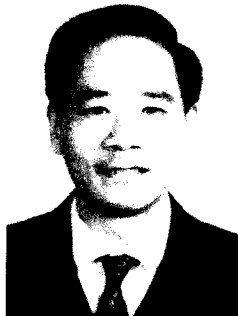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625印张 315 千字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8.50 元



晏智杰小传

晏智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任经济学院院长，校内外的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和中国国际贸易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晏智杰1939年12月16日生于古都西安，祖籍江苏仪征。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同年考取该系研究生，师从我国经济学大师陈岱孙教授攻读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196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1985年和1991年—1992年先后赴美、德研修访问。

晏智杰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近年来又扩展到中国经济改革及中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方面。已经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与人合著《政治经济学史》（陈岱孙主编）、《剩余价值理论释义》等，主编《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中日经济合作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序

晏智杰同志从事经济学说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已多年。最近，在这教研工作的基础上，他写了《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等各自独立又前后衔接的著作，将以付出版社，分期出版；来求序。

这些著作的目标是较全面、较系统而有一定新意的教材兼专著。它们以重商主义为上限，以马歇尔为首的所谓“新古典经济学”为下限，实为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一部断代史。它们固然适用于高校“经济学说史”一课的教材，但又具有专题著作的性质。

本书的特点在于打破现有经济学说史著作已形成的模式，在较全面、较系统的新模式下，对于这一历史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展中出现的重要观点、理论和人物，提出若干具有创见性的论述。

首先，是处理历史上主流派和主要人物与非主流派和非主要人物的地位和关系的问题。旧模式详论各主流派和主要人物的经济思想而忽略对非主流派和非主要人物思想的论述。因此，在旧模式中，出现的是一系列的挺拔的山峰，而缺乏联系诸峰的连绵起伏的群岭。本书力矫此弊，在论述中，一方面仍然侧重于对主流派和主要人物学说的论述，予以更大的篇幅。但在另一方面，对于次要学派和次要人物，无论其为主流派之支流或为其反面，只要其对主流派或主要人物的思想有某些补充、干连甚至质疑之处，本书都尽量予以不同程度的注意，使得本书所呈现的是一个山峦起伏、峰岭交错的整体画面。必须说，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本书的作者也许不是这种观点的唯一主张者。在最近两三年内，在国内还有少

数的经济学史家的著作文稿上也突出地出现了这一倾向,虽然迄今还未见有这类书稿的公开出版。

其次,是在旧模式中,强调以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学说史全书主线的处理问题。旧模式可能受到五十至六十年代通用于国内高校中的苏联教科书和专家讲稿的影响。这种主线的强调也许来自错误地以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史,从而经济学说史教材,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都只能以之为编写的范本。这一偏见又影响到对上述的流派和人物的取舍的问题。本书力图矫正这一偏见,在依然重视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发展在整个经济学史中的地位的同时,着意于兼顾其他各方面经济思想发展的论述。

也许更重要的是,本书如何处理对各学派和人物的述、评,如何在这些述、评中,提出自己的不同于前人的新见解。

五六十年代,经济学说史著作重评而忽述。七八十年代出现了相反的极端,重述而忽于评。本书绝然摈弃前者以简单化的、贴标签式的形式代替科学分析的“评”,也谴责后者,不问青红皂白一切拿来主义的“述”。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必须一方面认识到,其本质上所具有的辩护性,但在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其具有寻求经济规律的实证性。对于他们的学说的述评,必须既有确切的阐述,又有公正的评价。在这述与评的交叉中,作者对于有争议的,关于理论的评价,人物的臧否,提出了和前人不同的见解和判断。读者可以对这些见解和判断仍然提出不同的意见。学术的问题是允许讨论的。真理愈辩愈明。这也该是本书作者所祈求的。

陈岱孙

1991年8月20日

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前 言

本书是《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①的姊妹篇,论述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同时考察古典派的主要反对派,还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古典派的关系。同前一部著作一样,本书的目的也是在于为研习西方经济学说及其历史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提供一本教材,为深入了解政治经济学史的读者提供一部参考书。继本书之后,还将有《新古典经济学》问世。

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是对封建旧制度以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的批判,又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新时代的呼唤和论证。其最主要的发展出现于从18世纪70年代的亚当·斯密到19世纪60年代约翰·穆勒这一时期,而1800—1850年可以说是古典派的黄金时期。他们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主张构成了18世纪70年代后的大约100年间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主流和正统。这是本书上篇的研究对象。本书的下篇论述与古典派相对立的主要思潮和学派,它们在当时或被视为支流,或被目为异端。这主流和支流,正统和异端的发展和演变,它们彼此之间的论争和消长,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由于英国和法国处于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前列和中心,所以这个时期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主要

^① 晏智杰著:《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舞台和人物,以及它们的反对派,也大都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特别是英国。

鉴于对“古典经济学”这一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而正确把握这一概念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所以笔者特意在本书的概论章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若干看法,并以之作为本书的基础。至于有关经济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其他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诸如近代西方经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真理的划界标准以及近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期等,笔者在《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一书的绪论中已经作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本书汇总了作者多年来从事经济学说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对其中已经发表的部分在收进本书时作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在撰写过程中,我注意吸收了国内外最新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还认真考虑了专家学者、大学生和研究生及其他读者对我以往已发表成果或讲课的反应。对我来说,他们的批评建议同他们的首肯鼓励至少同样可贵。在本书问世之际,我愿重申欢迎指正的初衷。

陈岱孙教授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宝贵的支持和指导,除了应允我引用他的若干研究成果以外,还撰写了重要的序言。这篇序言是为包括本书在内的三部系列著作(另外两部是已经出版的《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和即将出版的《新古典经济学》)而写的。我对此深致谢意。当然,全书文责仍应由作者自负。

最后,我还要向资助本书出版的台湾开立工程公司总经理詹庚辛先生致以深切感谢。

晏智杰

1996年11月

于北大畅春园

古典经济学：概论

古典经济学：范围

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①这个定义从一方面看是太宽了，因为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等人属于前古典阶段的人物，西斯蒙第是古典派的批判者，他们本不属于古典派；但从另一方面看又显得太窄了，因为李嘉图以后还有一系列的人物继承和发展了他和他的前人的理论和学说，理应包括在古典派的行列之内，而马克思却将他们一概归之于庸俗经济学家的营垒。但凯恩斯把“那些接受李嘉图经济学而加以发扬光大的人，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歇尔、埃杰沃斯以及皮古”^②等都包括在古典经济学派之内也有问题，因为自马歇尔以后，这种“发扬光大”具有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李嘉图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很不相同的性质和特点，以至于我们把马歇尔经济学视为新古典经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② 凯恩斯著、徐毓楠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济学更合适些。^①

“古典经济学”，就其主体来说，应是指从 18 世纪 70 年代到 19 世纪 60 年代期间的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其中又以英国为主。1800 - 1850 年代可以说是其黄金时代。亚当·斯密 (1723 - 1790) 是公认的奠基人，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是人类经济思想史的不朽之作。李嘉图 (1772 - 1823) 则是继亚当·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的最伟大代表者，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21) 曾经是一个时代的英国经济思想围绕着旋转的中心。古典经济学此后的发展，正是沿着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展开的，无论那一种倾向，都没有离开他们所开辟的道路和园地。马尔萨斯 (1766 - 1834) 是李嘉图的密友，在一些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但在一系列经济学基本问题上他们又是论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李嘉图等人理论的一个重要支柱，他对市场机制中价格形成和变动的分析同斯密的学说有一定联系，但他对市场实现的条件的分析以及从中得出的有利于土地贵族的结论，却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李嘉图等人的信条大相径庭。但总的来说，马尔萨斯仍然属于古典经济学的阵营，因为他拥护和赞扬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制度。他要求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前提下，也要保护土地贵族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因而成为这个营垒中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萨伊 (1767 - 1823) 是亚当·斯密学说在法国和欧洲大陆的有力宣传者，他的经济学说，包括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① 1974 - 1975 年间，几乎同时出版的三本书对古典经济学的范围分别提出了独特的值得注意的观点。罗伯特·伊格利 (Robert Eagly) 认为古典经济学应当包括从 18 世纪 50 年代重农主义到 1874 年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托马斯·索厄尔 (Thomas Sowell) 的定义则以亚当·斯密学说作为划分古典派的基本依据；丹尼斯·奥布赖恩 (Dennis O'Brien) 强调了李嘉图在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之间的重要作用，认为对古典经济学所采取的任何立场，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亚当·斯密经济学的李嘉图变形的态度。参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译本第 1 卷，第 474 - 475 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年。我的看法有些介乎这里提到的后两位作者的观点之间。

和一系列基本原理,对当时和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发生了深远的不可忽视的影响。詹姆斯·穆勒(1773 - 1836)、麦克库洛赫(1789 - 1864)是公认的李嘉图的两位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也是使他们老师的学说归于破产的主要人物。属于这一行列还有影响小一些的德·昆西(1785 - 1859)。在接下来的年代里,相继出现了西尼尔(1790 - 1864)这样的又一位古典派中间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是一位资本主义制度的热心辩护士,但他同样对李嘉图等人的学说提出了许多异议,而且为后来经济思想朝着主观主义方向的发展提供了若干依据和启发。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 - 1873)以其《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为古典经济学作了总结,这个总结不仅企图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倾向加以调和,而且对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表现出了相当多的同情和容忍,他的著作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但这个衰落的过程是漫长的,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的所谓“边际革命”出现以后才逐渐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事实。在这期间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属于古典经济学家范畴的人物,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是凯尔恩斯(1823 - 1875),他通常被看作最后一位古典派理论家。

经济和思想背景

英国是古典经济学的故乡。古典经济学既是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反映,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进程。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冲突的深化与扩大,是英国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英国的人口从 1740 年代开始增长,在 1751 - 1761 年间人口的增长率达到 3.5%,1810 - 1820 年间更增至 16.9%。英格兰和威尔斯的人口数 1700 年不足 600 万,1871 年达到 2200 多万。国民收入在 19 世纪初期不足 5000 万英镑,1871 年跃升至 9.166 亿英

镑。人口剧增的同时,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幅在1%以上。实际工资水平在1840年后开始有了明显增长。

经济逐渐自由化,原来的许多干预和限制被逐步取消,是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生产中的又一引人瞩目的事实。皮特首相1784-1786年间曾改革关税;霍金森和罗宾森1820年代曾致力于贸易自由化;皮尔首相1845年大幅度减少关税,1846年取消谷物法等。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和生产的发展。英国的进口额1796年3960万英镑,1853年达到1亿英镑以上。同时出口也从3000万增至7100万英镑。

英国国内的生产结构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1700-1776年占40-45%,1821年降到26%,1871年再降到14%。农业的劳动力在全国的比重,1801-1871年间从36%降到15%。英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农业国家了。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机器生产的采用,使农业产量大增。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770年为24%,1871年升到38%。纺织工业和煤炭工业发展较快。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业面貌大为改观,1864年铁路总长已达11000英里。^①英帝国已经成为称霸世界的贸易强国和最大的殖民帝国。

生产发展是以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贫困难为代价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改组,把大批的农民和工人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沦为资本的附庸和工具。贫富的分化和劳动者的无权地位,导致了英国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工人运动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有了长足的进展,除了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一类的经济斗争之外,还爆发了要求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古典经济学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代表新兴产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思想。

^① D.P.O'Brien : *The Classical Economics*, 1975 , p. 16 - 17.

古典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又同当时的思想和文化环境和背景密不可分。诚如陈岱孙教授所说：“在这新历史情况下对于国家的观点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过去家长伦理的国家观相对立，出现了国家契约论。……国家契约论者认为，国家没什么超人的属性；国家或社会只是个人的总和……个人为达到某些公共生活的目的，主动地同意限制自己的天赋权利，把它交给国家，于是国家构成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关系是自由的契约的关系。在这关系中，主体是个人而不是国家。由这思想引申而同在的，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主体，而认为个人有下列特点。个人的第一个特点是利己……第二，就是理智……第三是惰性……第四，原子主义，认为个人是一个基本实体，社会只是个人的总和。社会的制度，组织和机制只为用于个人而存在。”^①

“自然法”哲学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这种观念源远流长，从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一直延续到17-18世纪，逐渐被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愿望的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锻造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这种哲学思想的基本信条是：在物质世界存在着某种根本的秩序；通过对所研究现象的论辩或直觉的感受，可以发现这些秩序；遵循自然法则便可达到最好的状态；健全的立法应当这些自然法则。自然法体系可以被进一步引申为如下的基本信念：自然法是不能人为地加以变更或取消的；自由是达到和谐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自然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②

① 《陈岱孙文集》下卷，第8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D.P.O'Brien : *The Classical Economics*, 1975, p. 22.

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点

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从起飞到昌盛时期的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他们的学说和政策主张忠实地反映和代表了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坚决地反对封建势力(马尔萨斯除外),也不顾及无产者的要求(约翰·穆勒除外),在各种反对派的抗议和批判声中,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了有力的辩护和论证。他们有大体相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有一脉相承的应时学说和观点,还有前后一致的以经济自由为中心的政策主张。

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相反,古典经济学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这是他们的最大特点,也是古典经济学们的最重要的共同点。他们坚信,自由竞争市场势力的自发作用能够保证经济生活的协调和稳定增长,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当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认为国家只需充当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类似思想在法国重农主义的学说中已见端倪,但只是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手上才得以系统地发挥,成为一种完整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学说。古典派从哲学基础和经济学原理上为其经济自由主义作了论证: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自由市场机制,才能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因为在一个分工愈益发展和细密的社会中,只有通过商品交换(为别人)才能满足个人的需要(为自己);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自由市场机制,才能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会促使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把各种生产资源用到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和产品上去;他们认为唯有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平等,因为不论产品和劳动在上市之前有多大的差别和不平等,一旦来到市场,就必须服从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这个通行的普遍法则面前,人人平等。他们还试图以生产三要素论、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资本节欲论等证明自由竞

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关系的平等与合理性,但没有达到他们自己满意的结果。最终实现这一目标的是后来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

关注经济增长是古典派的另一个共同点。自从斯密把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作为经济学主题突出出来,并且对之作了划时代的经典论述和分析以后,经济增长问题就成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一贯的中心课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全方位的。他们认为在经济生活的范围之内,首先是要增加生产,为此就必须增加资本积累,改进生产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有一种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他们还强调要有良好的政治、文化、道德等社会条件相配合。这样,关注经济增长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分配问题和产品实现问题,研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研究体现这些规律要求的经济政策等,就成为古典派经济学家们的又一基本特征。这同重商主义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同现代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也有很大区别。由于时代条件的发展和变化,现代经济学着力于考察在一定的稀缺资源条件下以及力争保持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和谐的前提下,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而在古典派那里,除了残余尚存的封建势力的障碍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的人为的或自然的障碍值得顾虑。他们放心大胆地要求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他们的信条是: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销售不出去。他们还不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何物,他们也不承认有这种破坏性危机的可能性。总的来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乐观派,只有李嘉图除外。

在研究方法上,古典经济学家大体上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注重经验归纳,另一种注重抽象演绎。属于前者的主要人物是亚当·斯密和萨伊,属于后者的主要有李嘉图和西尼尔,约翰·穆勒则主张这两种方法的综合。按照前一种方法,研究的进程大体上是收集和整理经验事实,并从中归纳出某些原理,再依据经验事实对

这些原理加以验证。而按照后一种方法,则在一开始就提出若干基本原理,然后依据这些原理对经济现象加以说明和判断。不用说,这两种方法是各有利弊的。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一定只能运用其中的一种而排斥另一种,而是始终在于经由某种方法所得出的理论原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在此前提下,究竟使用那一种方法,完全可以根据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而定。当然,这两种方法本身应当具有某些特定的要求和规范,例如,作为归纳依据的经验事实必须可靠和全面,才能保证从中得到科学的结论。同样,作为演绎的基本依据和前提,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抽象,否则必然使后来的推理和结论限于错误。古典派的方法在这两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和问题。这是值得注意的。

古典经济学的反对派

在古典派存在和发展的同时,作为其对立面和反对者的各种思潮和学说也发展起来,并同古典派展开了长期的起伏不定的论战和斗争。这种论战和斗争对古典派的发展和演变,包括对古典派内部的意见调整和统一,都曾发生过明显的影响。事实上古典派正是在同内外论敌的争论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西斯蒙第的学说是一种经济浪漫主义,它同情和怜悯受资本压迫和损害的广大小生产者,对他们的苦难抱有深切的同情,对社会的不公和贫富分化极为不满,由此出发批判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回到小生产的世界。这种学说代表了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空想和反动的倾向。

德国旧历史学派是德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卫士,他们对内主张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而对外则坚决主张保护主义,以之同先进的英国和法国相抗衡。结果他们的经济学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同英法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国民经济学。对德国旧历史学派,人们以往

多半加以完全的批判和否定,但事实证明这是不足取的。作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特殊环境和条件下的产物,历史学派对德国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是有极大贡献的。

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对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时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还有所谓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他们是从李嘉图的学说得出反李嘉图主义结论的资产阶级经济流派。

在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批判中,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古典经济学有一些共同点,但更有原则性区别。这当然是由于他们截然对立的阶级立场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所决定的。从根本上说,古典经济学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捍卫者,马克思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家。

对以上各家学说,本书将主要从他们同古典派的关系的角度,扼要地加以考察,借以展示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全景式的图画。

古典,庸俗,还是其他?

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对本书所论及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的发展,采取了同以往不尽相同的看法和立场。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的观点,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对传统观念(即把西方经济学划分为古典派和庸俗派)所提出的质疑^①。将资产阶级经济学划分为古典派和庸俗派,是马克思最初提出来的。它是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成果。这种划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认识变化过程。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资产阶级政

^① 以下摘自本人“古典,庸俗,还是其他?”一文,原载《北京大学校刊》学术理论版,1989年4月5日。